

語文学习参考材料(六)

寫作方法参考

一九六二年二月

漫談寫作

胡 繩

今天我想和同志們談談關於寫作的幾個問題，包括：準確、簡明、重點突出、邏輯次序、綫索和語言六個問題。

(一) 准 確

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條〉里提到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他首先提出了準確性。

他解釋了什麼叫作準確性。他說：“準確性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問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詞章問題。”他指出我們一般寫文章，寫報告，寫總結，有這樣一些缺點：概念不明確，判斷不恰當，等等。寫文章首先要準確。準確跟正確的意思稍有不同。準確性首先要要求思想內容正確，也就是說人的思想要符合客觀實際。不論寫一個報告，一個總結，還是寫一篇文章，都要求內容正確。內容正確，這是內容問題；今天我們所說的準確性，比較偏重於形式方面的問題，至於內容，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這些我們不談。

我們說的準確是什麼意思呢？

毛主席說：“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第一，概念不明確；……”我們就首先從概念說起。寫一篇文章要運用很多概念，這些概念要很明確。不僅寫的人自己要知道他用的每一個概念到底是什麼意思，而且要让讀者一看就知道它是什麼意思。概念明確，它在內容上也

可能是根本錯誤的，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即使不符合实际，也要把那个概念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使大家一看就知道錯在什么地方。

当然，正确性和我們这里所說的准确性有关。一个概念根本不正确、不符合实际，这样的概念使用起来往往是模糊的、不明确的。你們看过胡風的文章嗎？那些文章很难懂，概念不明确。他运用了很多概念，但让人看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修正主义者的文章也是如此。南斯拉夫铁托的文章、报告，概念也不明确。問題就在于它的内容不正确，是根本錯誤的。他的錯誤不能明白地摆出来，为了掩盖錯誤，就要把概念搞得很模糊、曖昧。一个概念說出来又好象是这个意思，又好象是那个意思，使人捉摸不定，这样作者就可以在那里玩花样，把錯誤掩盖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來說，正确跟准确有关系。当然，也有概念完全錯誤，但是搞得很明确的。例如有些公开的唯心主义者，他們所讲的内容是不正确的，但是他們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他們的概念明确。我們現在是在正确的基础上要求把概念搞明确。

回顾一下最近两三年的情况，有一些文章确实有概念不明确、不准确的毛病。一篇文章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这都要用概念把它概括起来。但是有的概括得不清楚。例如前两年在报纸杂志上有这样一种說法，叫作反对“条件論”。“条件論”算一个概念。什么叫“条件論”？这个概念不清楚。本来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客观条件为借口、不鼓足干劲、不力爭上游，而安于少慢差費这样一种倾向。反对这种倾向对不对呢？对。但是，由于用了曖昧不清的概念把这种倾向概括出来叫作什么“条件論”，就把事情搞乱了。好象做事情可以不管条件，讲条件就要反对。提出反对“条件論”的人，他本来的出发点是对的，是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但是得出反对“条件論”这样的概念，就变成不允許讲客观条件了。所以，

我們說“条件論”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这种不准确的概念会引导出不正确的結論来。我們反对“条件論”，好象我們就是无条件論者，做事情可以不讲条件，不管時間、地点、条件。象这一类文章就是概念不明确，它使人看了不知道作者究竟是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本来是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可是看来好象反对承认任何客观条件；本来是主张正确發揮主观能动性，結果变成了主张什么条件都不管，主观能动性可以任意發揮。从这里可以看出概念不准确这个缺点有什么坏处。

还有一个地方提出过“反对××地方落后論”。这个概念也不准确。这也可能是指的反对承认自己这里經濟、物質各方面都落后，也可能是指的反对自甘落后的思想。毛主席說：中国一穷二白。这叫作中国落后論，这个也能反对嗎？当然不能反对。可是毛主席并不是主张中国要永远穷下去。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天生应该穷的，現在的穷不是不能改变的。我們反对自甘落后，但这不能叫作反对“中国落后論”。中国要前进，就要看到現在的落后，必須从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这个基础上多快好省地向前进。本来反对的是认为中国天生落后、不应该前进、应该安分守己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能不能概括为“中国落后論”呢？如果这样概括就不准确。如果这样概括，就会使人誤会成必須否认中国現在經濟等方面的落后状况，根本否认一穷二白；一定要說中国現在經濟上已經很先进了，物質条件已經很先进了。这样的概念是不准确的。提出“反对××地方落后論”的人，他原来的想法、出发点可能是对的，他反对了应该反对的傾向。但是，科学的概念是从实际中来的，它要概括出事物最本质的东西。对一个錯誤的东西，說它是什么論，就要把它的本质說出来。如果一个人說整个中国或者某一个省落后，并且要永远安于落后，那么他的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他的錯誤不在

于說中国或某个省今天一穷二白，而在于說中国或那个省要永远一穷二白下去，在于认为不应该改变一穷二白的现状。要把这个錯誤概括出来，就要用能够說明这个錯誤的本質的概念，不能概括成为“中国落后論”或“××地方落后論”。如果說中国落后論是錯誤的，那末世界上就沒有人敢說中国一穷二白了。由于概念概括得不准确，結果反对什么东西就不清楚；反对什么东西不清楚，主张什么东西也就不清楚了。

提出一个概念，特別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工作，它要反映出人的認識上的一个新的阶段。例如，看到很多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意見，看到形形色色歪曲馬克思主义、破坏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概括起来說，这种观点是修正主义。这样一概括，就对各种反对馬克思主义的傾向有了一个总的、概括的認識，这在認識上是提高了一步。既然如此，我們提出一个概念就要把它搞得很清楚。

当然，一个概念只用简单的几个字表示出来，单靠字面，有时不能充分地把它的内容說清楚。例如，列宁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如果望文生义，就很难看出它們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上一阶段搞了一个經濟政策，这个阶段又搞了一个經濟政策，这就叫作新經濟政策。新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也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看出来。因此，当他們提出这些概念时，对这些概念都作了明确的說明。这样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說是一种简称。毛主席提出新民主主义，是因为旧的资产阶級民主主义已經过去了，对旧民主主义來說，我們无产阶级领导的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当然，不可能一讲到这个概念就用那么一大串話來說明，不可能一

說到新民主主义，就說“无产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这是一个简称，同时它也表明了与旧的、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区别。

毛主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总是要給它以充分的說明，使这个概念很明确，毫不含混。资产階級也可以滥用“新”字。馮友兰就有一大套书叫作《新世界觀》，新什么什么。他那个“新”的概念就是含混的。是不是真正地新呢？那只是一个招牌。对毛主席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作任何歪曲，因为他作了明确的說明。

“新經濟政策”，它成了专门的名称，它的内容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提出的粮食稅、利用商业、小农經濟和国家經濟相結合、允許資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等等。列宁当时对新經濟政策作了明确的解釋，它也是明确的，毫不含混的。我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毛主席提出反对官僚資本时，他用了一系列的話，把“官僚資本”这个概念說得非常明确。本来他写的不是什么教科书，而是說明党的基本政策的一个报告，在这里，他使用了反对官僚資本这个概念。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当时，要使广大人民都懂得这个概念，不仅领导懂得，而且群众也懂得，因此他对这个概念作了明确的說明。毛主席說：“这个垄断資本，和国家政权結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这个垄断資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階級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結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資本主义。这就是蔣介石反动政权的經濟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資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階級，損害中等资产階級。这个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質条件。这个資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資本。”

（《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1253頁）这里主席把“官僚資本”这

个概念的含义說得很清楚，使全党全国人民一看就懂得官僚資本是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概念不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但是在全国快要解放时，这个概念特別重要，所以有必要明确地說明它的含意和内容。

我們使用新概念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在文章里給它下定义，有的时候不需要下定义，但是它的含义一定要明确、清楚。在邏輯上，使用一个概念，前面是一个意思，后面又是一个意思，那样就含混不清。概念要有很确定的意思，准确地表达一个内容。

实际生活是向前发展的，新的概念也必然要不断地产生。我們是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我們认为，概念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实际生活向前发展，就必然要不断地产生新的概念。这两年来，在我們各方面的工作中都产生了許多新的概念。我們作編輯工作的，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稿件，从它們所使用的概念中，看不出它們提倡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看了半天也不知道那个概念是什么含义，是什么内容。这种情况就叫作概念不清。我們說它不准确，不說它不正确，因为它的意义不一定完全錯。修正主义者使用的概念完全是錯誤的，而我們有些文章中所使用的概念是沒有准确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

概念是这样，判断也是这样，有时判断也不恰当。指出一件事是好是坏，这是一个判断。例如，“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是非正义的，古巴革命政府领导人民起来反击侵略者是正义的。”这是一个判断，是正确的判断。如果說“美帝国主义是正义的，古巴是非正义的”，那就是根本錯誤的判断了。我們現在不說正确不正确的問題，我們說判断是不是适当的問題。

判断是不是适当，这里有分量問題，有条件問題。什么是分量問題？在形式邏輯上有全称判断和特称判断，这里就有一个分量問題。

題。我們說，“一切人都要死”，這是全称肯定，把一切人都無例外地包括在內；說“有些人是中國人”，這是特稱肯定，是講的一部分人。講全部時，要作全称判斷；講一部分時，要作特稱判斷。作判斷時，如果不注意分量，判斷就不會恰當。馬克思說：“一件事只有在適當的範圍內才是正確的，如果夸大了它的範圍，就會變得荒謬不可理解。我們說，“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客觀條件是可以改變的”，但是，如果說成一切條件都可以改變，那就有毛病。因為在實際工作中，有些條件是可以改變的，有些條件是不可以改變的。當然，從哲學的意義上來講，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你說四季氣候不會改變？你知道一百万万年以後氣候是不是還是這樣？大概也會改變。但是現在安排農業生產，我們就要根據現在無霜期的長短和降水量的大小來考慮。這是客觀條件。這些條件能不能改變呢？科學可以搞人工降雨，條件也可以改變。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不能從一切條件都可以改變出發，不管一年無霜期有多長，不管一年降水量有多少。有些條件可以人為地改變，例如新疆地廣人稀，這個條件就可以人為地改變，但也不是幾十年就能改變得了的。現在在新疆布置工作，就不能忽視地廣人稀這個條件。

最近一兩年來，有些判斷就忽視了分量和條件問題，作一個判斷，不考慮那是在什麼條件、什麼範圍內作的。例如“農業增產是無限的”，這也算是一個判斷。農業產量的增加是無限的，這個判斷可以作。可是對這個判斷要加以說明，說明這是從長遠來說的。在一定的範圍、一定的時間里，增產又是有限的，不能說每一個具體的期間增產都是無限的。不管條件就作出判斷來說，增產潛力是無限的，這樣的判斷是不適當的。過去有些文章常常是夸夸其談，一開始就作全称判斷。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就是說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再沒有例外。我們現在作一個判斷，就要注意分量，

注意一定的限度。几年来出現了一些新的語汇，象“基本上”，就表示了一定的限度。說一个人好，不作全称肯定，而說这个人基本上是好的，对一个成功的工作，說“这个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这样的判断就有分量上的限制。这个語汇是在我們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发展起来的，这就表明我們对判断的恰当比較注意。当然，也不要乱用这些語汇。有的时候，不能简单地說某件事情正确，不能对它作全称肯定，这时就要說“基本上正确”，“大体上正确”或“主要方面是正确的”。这主要是考虑到判断要恰当。要使判断准确恰当，就应该把什么条件、什么范围說清楚，凡是应该说清楚的都要說清楚。現在我們的文章中流行一种不負責的說法。作者既不愿意对他的判断作完全的肯定，又不把这个肯定的分量、条件說清楚。例如，研究文化遗产，在說明某个詩人、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意义时，总是說：“这种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这个話比較保險。“一定程度”，到底有多大，不知道。他不敢完全肯定，但是到底有多大分量，他也說不出来。实际上，这个“一定”就是最不一定。說不出来了，就写上“一定”。“一定的进步性”，“一定的人民性”，“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等等。这是一种滑头的办法，让你抓不住他。

(二) 簡 明

从看稿件和閱讀已經发表的文章中，我突出地感到，現在文章有一个发展趋向，就是不簡明。明，就是要明确，这里也有准确的意思。明确还要簡單。簡，不是簡陋。有的人思想很貧乏，沒有什么話可說，写出来的东西很簡陋。小学生作文，开始只能写那么一点，說几句话就完了，二百字就算是一篇文章，他写不多。但是隨

着年齡的增加，文章也就愈寫愈長。現在通常的情況是文章寫得太長，太囉嗦。太長是不是表示思想很豐富呢？有的時候並不表明思想豐富，在某種程度上倒正是一種思想貧乏的表現。如果他的思想很豐富，寫的內容很多，文章長那是必要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很長，在長的篇幅里面說了很多內容，使人看了之後懂得很多事情，這樣的長是需要的。但現在的文章是長而不解決問題，不說明問題，文章說了很多話，說來說去還是一個意思。這叫繁瑣，囉嗦，並不表明思想豐富。把事情講清楚了，而不要說很多的話，這是簡明。

有一次（大概是在反右派的時候），幾個同志在一起議論，想寫一篇分清左、中、右的文章，說清左派是怎么回事，右派是怎么回事，中派又是怎么回事。左派是怎么回事容易說，就是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右派也容易說，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對中派作一個描寫，就不大容易。大家七嘴八舌地湊意見，湊起來一看，把中派說成是反對社會主義、不贊成黨的領導的，這樣中派就和右派差不多了。大家感到這樣不合政策，需要重新考慮。大家又湊一次。湊起來再一看，這次把中派說得和左派又差不多了，也覺得不對頭。到底中派是怎么回事？又經過一番議論，大家才明確認識到，中派的特点就是動搖于左派與右派之間。說明它的動搖，就要寫出它的兩面性，光寫這一面或是光寫那一面都不行。這樣，要講清楚中派，只要把右派與左派講清楚，指出在它們中間動搖的就是中派，一句話就可以了。當然也可以寫得更多一些。因為中派是動搖的，它常向兩極分化，可能是中間偏右，也可能是中間偏左。對中派這樣描寫就很簡明。這個例子說明，思想上真正清楚了，寫下來的東西就不會囉嗦；話說得很多，愈說愈不清楚，其原因主要就是自己沒有想清楚。

從這裡可以得出一條規律，那就是寫作時要想得多，寫得少，

先想清楚了，再写时就少了。如果想了十分，只要写出五六分就好了；如果写十分，就要想二十分。最不好的是想了五六分，却写了十分。思想很貧乏，結果只好玩弄字句，写得一点不清楚。語言多并不是思想清楚的反映，恰好反映了思想不清楚、不明确。拿毛主席說明“官僚資本”这个概念作为例子来讲。他說明这个概念所用的語言是很概括的，在只有几行的話里，說明了中国的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作用、性質以及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同富农的关系等等，內容非常丰富。可見这几句話不是随便写出来的，只有对問題作了深思熟慮才能概括出这几句話来。

当然，一个人的思想不是憑空来的，不是从主观世界来的。思想上要想得多，就要多接触世界，多积累实际材料。中派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憑空想出来的，一定要在实际斗争中对中派有了認識，才能想这个問題，想了之后才能对它作出概括。这里所謂的概括，既不是繁瑣地罗列事实，罗列現象，把自己所想到的什么东西都摆出来，也不是抽象到哲学那样的高度。我們写文章常常犯这个毛病：要就是繁瑣地罗列現象，要就是抽象成空的。什么叫抽象成空的呢？昨天我看了一个材料，是一个工厂的工人給几个厂长貼的大字报。大字报对每一个厂长都用一句話作了批評，批評一个厂长是“方針政策”，另一个厂长是“两条腿走路”。誰也不知道方針政策和两条腿走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概括就抽象成空的了。

我們写文章应该有严格的要求。文章不能有廢話，不能有說不清楚的話。外国学校里有論文答辯，我們有些文章就經不起答辯，写的一些話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根据，都不清楚。我們自己写了文章，人家要是真地来辯一下，問我們这段話到底說明什么，为什么非說不可，可能就答不出来，許多文章在繞圈子，說了半天还是那个意思，这样的文章就不好。写文章不要重复，好文章，象毛主席的

文章，是沒有重复的。当然，有时候重复是必要的，但是一般說来，如果已經說过了，再說一次，又沒有增加什么新意思，沒有更深入一层，那就是在繞圈子。本来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反來复去說了一堆話，这样不行。小学生开始写短文，后来要求写长的，从一二百字提高到一两千字，这是进步。进步到一定程度，又要反过来，本来写一万字，要改成八千、五千，甚至四千字，这才算进步。我們看毛主席的文章有长的也有短的，他写得那么短，但是說了那么多意思，說得那么清楚明确。在延安时，乔木同志写过一篇短文，題目是《短些，再短些》。現在我們写的文章，一般从一万字刪成八千、五千字比較好。許多文章往往在开头的地方有一些空話，这些就可以刪掉。

文章的开头是很难的。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毛主席的文章，看它們是怎么开头的。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一开头就把問題提了出来，指出在合作化运动中有右傾机会主义，他們象小脚女人一样，东搖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这里一下就把問題提出来了，不讲什么廢話，不加什么空帽子，簡單明了，問題鮮明。

我們写好一篇文章之后，要认真推敲它的每一句，每一段，看它們是不是站得住，是不是非要不可，然后加以刪改。从我們編輯部的經驗来看，改文章是学习文章的好办法。我們的办法是，把一篇稿子拿来（最好印出来每人一份），几个人坐下来一句一句地讀下去。文章是不是經得住一句一句地讀？好文章經得住，差一些的就經不住。这一段为什么要？可以不可以不要？有时文章一刪一大段，很痛快。刪掉之后，文章就清楚了。大家坐在一起，从头到尾把一篇文章扣一下，从内容到形式包括标点符号、文章写法、結構在內，都扣一下，这对学习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也是改文章的好方法。

要求簡明是不是有片面性？它会不会把文章搞得干干巴巴地只

剩下一副骨头架子，没有一点油水？如果片面地讲少，片面地讲篇幅短当然也不对。文章总是有繁有简，有的地方说得多一些，有的地方说得少一些，必要突出的地方要说得突出。

（三）重点突出

光讲简明可能搞成片面性，这里还要讲一下重点突出的问题。讲简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论什么意思都只说一句话，不许说两句话。我们写文章，有些问题需要着重说明，对这些问题我们就要想办法讲透，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这是不是违反简明的要求呢？不是的。这种着重是必要的，不是繁琐的，它不会使人感到囉嗦。例如，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里说：“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9页）这个意思，到这里也可以说是表达完了。但是因为对大家说这是一个新问题，要把这个意思真正说透，只说这么几句话就显得不够。所以主席接着又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同上）前面讲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后面又说了这样许多话，这会不会使人感到重复呢？不会。他使用新鲜的语言，对这个问题作了必要的强调，并不使人感到重复。接着主席又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同上）在当时，提醒大家不要自满，使大家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只说一句不够。主席接着又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

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象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40頁）在這裡必須說明的思想，作者沒有輕易放過。為了把它徹底說清楚，作者使用了較多的語言。在不需要很多話就可以說清問題時，作者要吝惜語言；但是在必須用較多的話才能把問題講透時，他就要毫不吝惜語言，就要使用足夠的語言。再舉一個例子來看。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文章，在開頭那一部分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決不了中國問題、只有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解決中國問題這樣一個思想。為了說明這個思想，主席在第二段就提出了問題，說：“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4頁）下面是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對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的敘述，說明中國的情況也是這樣，也是要尋找革命的真理。主席說：“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年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同上）這裡的意思是說：中國的落後狀況和俄國是近似的，中國的先進的人們為了尋找真理也經歷過許多艱難困苦。如果設想一下，讓我們來寫這篇文章，寫到這裡該怎麼辦呢？很簡單地說幾句話，也可以說：先進的人們為了革命去尋找革命的真理，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最後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在找到馬克思主義以前，用資產階級思想沒有解決中國問題，只有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才解決了中國問題。我們可能用這樣幾句話來講。但是主席不這樣寫，因為這裡正是重要的地方，需要着重說明。資產階級思想為什麼不能解決中國問題呢？主席從一八四〇年講起，講洪

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一派人物怎么样走西方的道路，甚至还讲到他自己在青年时期学习的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通过历史事实的追溯，说明了学习资产阶级那一套行不通。然后主席指出，十月革命来了，中国的面貌才发生了变化，并且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6页）下面说的就简单了：“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同上）这里说得非常简单。在一九四九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走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还是走无产阶级国家的道路，因此，资产阶级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这个问题，就要着重地予以说明。论证了资产阶级的失败，就说明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就说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问题。至于后边讲到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地方，由于当时革命已经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而话也就可以说得简单些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写文章要有繁有简，重点地方要作充分的论证，而在另外的地方则要简单扼要，这里也要反对平均主义。

在我们的文章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不需要着重说的地方说了很多话，而到了真正要紧的地方又没有什么话说了。例如，《红旗》编辑部的同志写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原来我们讨论时说：不要对农民采取剥夺的办法，这个思想很重要，写合作化问题强调这一思想有现实意义。等到文章写出来时一看，讲到这里只有一句话，就是：“对农民不能剥夺”。我说：“这不是重点

嗎？”他說：“說不出來多少話，對農民就是不能剝奪就是了，沒有什麼話好說。”後來作了一些補充，現在來看也不見得說得夠，因為要說夠了，的確不容易。

從上面講的例子看出來，毛主席在應該強調的地方是怎麼樣強調的。這里面不但有認識問題，而且有修辭問題，有知識問題，也有掌握語言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捧場”這個詞本身就是引起人們注意的語言，下面他又用了“糖衣炮彈”這一系列的語言來強調說明。下面他又說，革命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以後的工作還更偉大，更艱苦。這個思想如果讓我們來說，一定會說成：“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不要驕傲自滿，往後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是毛主席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9—1440頁）諸如此類，這不僅是語言形式問題，而且說明作者的思想是十分豐富的。我們有時候對一個問題並沒有真正的認識，而是人云亦云地說一下，敷衍了事，說過去也就算了。這里而就有一個知識的問題。毛主席說資產階級思想在中國不能解決問題，他怕有人對這一點有懷疑，不肯放棄資產階級思想，因此，從康有為說起，在這里，他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如果我們不掌握這些材料，就不可能用足夠的語言來強調說明這一點。所以，這不只是形式問題，同時還是內容問題。

有時候，我們大體上知道某個思想是要強調的，但是因為語言貧乏，強調之後，不能加深讀者的印象，反面使人感到繁瑣。比如描寫一個風景，你說：“很漂亮，很好看，簡直漂亮極了，簡直好看極了。”你用了許多形容詞，別人也不知道這個風景究竟怎麼好

看。如果要描写一个風景，你自己必須認真地观察过它，从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观察之后，然后进行概括。我們不可能把观察到的每一点都写到文章中去，而必須找出其中最动人的某些方面概括地写出来，这样才能使人讀了如同身临其境。如果我們用一些空洞的形容詞堆砌在那里，人家看了就会感到討厭。

因此，要突出重点，就要有丰富的語言。这并不违反想得多写得少的原則。要写得丰富就要想得更多。毛主席在写資產階級思想不能解决中国問題时，他找的材料很多，但是他只写了一点。只有掌握了大量材料之后，才能用概括的語言說明問題。毛主席就是通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怎么样追求西方文化，来概括地說明問題的。而我們在文章中要着重描写某一点时，事先沒有經過真正仔細的調查，只是从印象出发，因此就只能用一些空洞的形容詞。因此，必須积累足够的知識，有丰富的思想，然后写文章时才能在重点地方着重地加以說明。

(四) 邏輯次序

一篇文章有很多段，每一段里有很多句子，一段与一段之間、一句与一句之間要有一定的次序，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有一定的邏輯。我們說文章要有邏輯性，邏輯性就表現在次序上，是不是合乎邏輯，就看次序是不是順当。为什么有的文章写得重复繁瑣，前边說过的，后边又說了？这往往就是由于怎样一段一段地說下来，沒有找到适当的次序。

我們下面看一下毛主席的文章。《中共中央毛澤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全文只有一段，一下說到底。这样的文章一口气写下来，不分段，但层次很清楚。文章写到这样的程度是很不容易的。